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成果

社会、人和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

● 金经元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科研成果

社会、人和城市规划的 理性思维

金经元

中国城市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1 号

社会、人和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

著 者 金经元

选题编辑 黄 钢

责任编辑 李维惠

封面设计 仝开建

责任印制 刘超声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阳区和平里西街小黄庄路 1 号(邮编 100013)

电 话 4235833 电 传 42145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4.75

版 次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50

书 号 ISBN 7—5074—0598—2/Z·137

定 价 9.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序 一

曹 洪 涛

金经元同志从事城市规划工作 40 载,在花甲之年,潜心著作,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把自己的观点无保留地献给同行们,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

建国以来,中国城市规划工作走过的道路是曲折而坎坷的,上过“天堂”,也下过“地狱”,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思想政治路线拨乱反正以后,才重见曙光。但仍像一个身罹重病刚刚痊愈的人,步履维艰。近几年,在一片开发热的大潮中,城市规划似乎还有点招架不住的样子。

作者以切身的经验教训,在认真思考之后,勇敢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针砭时弊,并通过广征博引古今中外的丰富资料和事例,呼吁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同事们,要时时保持清醒的科学头脑,时时保持高尚的职业道德,时时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方向,以便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城市规划怎样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内涵是什么?怎样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道路?这要通过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进而升华到理论。我们本来具有优越的条件,但却缺乏自己的(中国的)系统理论,难道这不是我们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同事们应该深思的问题,难道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吗?

作者开了一个好头(尽管有的问题还需要深入地探讨)。我认

·i·

为《社会、人和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这本书不但对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专业人员有用处,而且可以说对一切从事城市建设的朋友和各城市的领导者,也颇有参考价值。作者在写法上不是就事论事,直观地写城市规划,因而读来并不干涩。我读了初稿确实增长不少知识和受到很大启发,是为之序。

1993年7月26日于北京

序 二

金 经 昌

《社会、人和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是一本工具书。书的作者根据他在城市规划部门多年工作中的感受、经验、体会，记录下他在规划工作中的一些理性思维，用发人深省的文字，言简意赅地写出城市规划中的这些精义，希望为城市工作者所重视，更希望领导城市工作者不予忽视！希望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同行们共同求索，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地、逐步地走出城市规划这困惑的世界。希望大家共同来为人民服务！

城市规划不是为某种意图来个“你要什么，我画什么”，城市规划工作者不能把自己的职业仅仅理解为个人谋生的手段，否则就失去了城市规划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对本书中的内涵，如果细细咀嚼，一再品味，必能一步一步地进入城市规划的佳境。如果囫圇吞枣，就不免认为它淡而无味了。

研究城市规划工作必须研究社会和人。要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于社会现象的冷静而严谨的思辩，理解人、同情人、关怀人！城市规划在工作中还要有教育群众的内涵。

城市物质环境就是人的物质环境。规划人的物质环境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物质环境能影响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又影响城市的物质环境。一些细小的、习以为常的项目在进行规划时都需要冷静地再认识。

本书作者一开头就以“鸡笼托儿所”来隐喻今天城市中出现的

“乡”的发展,这是对城市本质认识上的模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封闭的城市”,许多小城镇的兴衰和当地农业的兴衰有着共同的命运。城市周围人口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人口的素质。

人口规模超过百万、千万的特大城市,它的经济辐射能力能影响到全国、全世界,这时城乡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扩大为全国性、世界性的关系,因而它们是全国的、全世界的城市。其他城市或其他地区则成了它们的“世界乡村”。世界乡村成了农产品初加工和外来工业原件组装的基地,更不幸的是,它也成了从发达地区迁出的污染工业的接收地。工业发达的经济大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正反映了这种扩大了城乡关系。只顾城市,不管乡村,其结果不仅伤害了乡村,也抑制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城市规划必须注意到城乡关系的协调。

研究人的物质环境建设,必须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综合起来考虑。处理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时,必须谨慎从事。不要用自己创造的文明去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城市愈发展,愈要重视保护自然环境!

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统一,决定了城市物质环境。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不应导致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洪水泛滥;不应导致空气、水体、大地受到污染;不应导致臭氧层遭到破坏……人间若无一片净土,人类将如何生存下去?考虑到人的生活活动需要,每个人应占有 30—40 平方米的城市绿地。人的血、肉和头脑都存在于自然界,属于自然界。把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城市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城市!

城市规划在本质上就具有超越本部门利益、参与社会发展总体决策的性质。社会综合效益既是城市规划工作思考问题的起点,又是规划质量优劣的最终标准。审查城市规划方案,如果不看它是否有利于全局的发展,而是看它是否符合于委托者的愿望,城市规划最终不过是“老板的规划”。这样无须调查,倒也省事!市场经济

愈发展,愈不能不注意宏观的调控!

1979年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人把城市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外商,外商指向哪里,城市规划就做到哪里。城市规划由初期的依靠国家计划变为所谓适应市场经济,只听从老板的摆布,满足甲方委托设计局部环境的利益,就顾不得保障社会利益了。

本书的作者在书的末尾提出了对改进城市规划工作的一些设想。旨哉言乎,不可不读!

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有关城市规划工作问题的书。

1993年7月于上海

目 录

序一(曹洪涛)	(i)
序二(金经昌)	(iii)
引言	(1)
第一章 走出这困惑的世界	(8)
第一节 当今世界的历史地位	(10)
第二节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15)
第二章 人——斯芬克司之谜	(20)
第一节 人类的由来和进化	(21)
第二节 人类的成长和环境	(27)
第三节 人和社会环境的互动	(34)
第四节 人的素质和人的需要	(39)
第三章 有机变幻的城市	(44)
第一节 城市和乡村的相互依存性	(48)
第二节 城市社区的有机整体性	(51)
第三节 城市的阶级性	(53)
第四节 城乡结构形态的历史阶段性	(63)
第四章 城市规划和理性的思维	(70)
第一节 市场经济愈发展,城市规划愈要注意宏观调控	(75)
第二节 城市规划是一种社会规划	(77)
第三节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79)
第四节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82)
第五节 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统一	(83)

第五章 充分发挥城市的教育职能	(90)
第一节 城市环境和儿童的成长	(92)
第二节 成年人的素质和对社会的感情.....	(100)
第三节 老年问题——社会素质的后期反映.....	(105)
第四节 吸烟、酗酒——社会的心理变态	(112)
第六章 改进城市规划工作的几点设想.....	(126)
第一节 研究社会现状,制定城市发展战略	(127)
第二节 由近及远,留有空白	(133)
第三节 培养当地的城市规划人才.....	(136)
后记.....	(138)

引言

漫画家笔下的“鸡笼托儿所”确实过分夸张，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这样古怪的托儿所。然而，它确实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把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现象集中反映在一幅小小的画面上，激发起人们的各种联想，诱导出人们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小事的再认识：难道我们就该如此？这的确是一幅耐人寻味的佳作。



图1 鸡笼托儿所^①

如果单纯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个托儿所有它一定的合

^① 《世界博览》，1991年第4期。

理性。孩子们有吃、有住、有玩具、有专人监护，每人各有自己的活动空间，绝不会发生相互打闹、吵架，以致碰破皮肉的危险，生理、安全都有保证；不仅省地，而且省事；在上班时间阿姨们完全有空去编织她们的毛衣。

然而我想，对于年轻的父母来说，他们一定不愿意把自己心爱的小宝贝送进这样的托儿所。对于他们来说，即使这个托儿所造型新颖、设备讲究，它仍然缺少得太多、太多：它完全忽视了保证儿童人格健康成长的需要。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仅仅是维持生命存在的最基本需要，除此之外，人们还有更高层次的其他需要，那就是：社会交往的需要，爱情、友谊和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马斯洛的理论，但是，年轻的父母们必然会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对子女未来前途的关心，得出即使不成系统的、但内容却近似于马斯洛的结论。人类的成长不仅需要保证生理健康的物质条件，还需要保证心理健康的社会条件；而且，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间，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之间，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同意这一看法，其中甚至也包括建设鸡笼托儿所的决策者和设计者。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想认识和行为脱节的现象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脱节并不少见，不足为怪。在纷繁的社会分工中，每一个人所处的工作岗位只不过是社会面中的一个点。从社会整体来看，每一个局部不论它多么细小，都是保证社会整体健康运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从局部来看，往往就像瞎子摸象，容易就事论事，看不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因此，当有些人谈到儿童教育或老人问题等与社会全局直接相关的问题时，他们会理智地承认社会整体健康运行的重大意义；而一谈到自己的本职工作，就仅仅看成是个人的谋生手段，容易固守自己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不能从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上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这是局部和整体的矛盾在认识上的反映，它既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要做好本职工作应该随时警惕的一种思想障碍。对于城市规划工作者来说，克服这种思想障碍尤为重要。因为，城市规划工作者在规划城市物质环境建设时，既要考虑社会当前的需要，也要考虑社会发展的前途，必须高瞻远瞩、努力进取，而不能把自己囿于个人得失的方寸之地。如果一个城市规划工作者把自己的职业单纯理解为个人的谋生手段，那么，他就失去了作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从“鸡笼托儿所”的窗户向外看，高楼林立。倘若从透视学的角度来分析（当然，漫画一般并不严格遵守透视学原则），这个托儿所很可能就在一幢高楼之中。难道漫画家想借助于“鸡笼托儿所”来隐喻现在不少城市中出现的高楼林立现象带有“鸡笼”特征？我不敢断言。然而，城市建设的规划者和决策者，由于对城市和城市生活的内涵理解不深，忽视城市生活深层次的需要则是常有的事。譬如说，近年来，有些开发商在开发城市用地时，过多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片面地提高容积率，忽视了为居民留出必要的活动空间；有些旅游宾馆的建设，粗暴地破坏了风景资源，甚至出现有损社会风尚的活动；有些城市在旧城改造中热衷于中心商业区建设，不惜迁走当地居民，切断了他们原有的社区联系，人为地创造一个类似于纽约、东京、香港的繁华地段。这些建设对于社会的发展会有哪些影响，真是值得深入研究。

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发展迅速，成绩巨大。据1948年4月南京政府内政部方域司编印的《中国之行政督察区》刊载，当时全国共有67个设市城市和2016个县，另有21个旗和35个设治局。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当时在中国大陆做过或部分做过现代城市规划方案的只有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大连、石家庄、青岛、济南、南京等十几个城市，而且，其中大多数还是入侵的帝国主义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在他们控制的势

力范围内所作的。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建设座谈会，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到1990年底，全国大陆部分设市城市达467个，建制镇达12084个；设市城市全部编制了城市总体规划，建制镇的85%以上也都做了总体规划。

然而，由于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薄弱，大量的城市规划实践还有待于总结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理论还有待形成。就城市规划理论而言，丰富的营养还没有充分消化、吸收，虽有40多年的经验，但尚未进入“不惑之年”。

我们不妨概略回顾一下城市规划40多年的历程：

1952年到1957年，城市规划工作基本上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全面开展起来的。当时对城市规划的定义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所谓“国民经济计划”，实际上主要是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点工业建设项目。这些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安置在哪里，哪里就编制城市规划方案以适应城市的大发展。这样编制出来的城市规划方案，主要工业建设项目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和城市建设的投资来源都比较可靠，保证了这些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一般说来，各个重点工业建设项目都能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建成投产，职工的生活设施也有基本保证。然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外来的工业建设项目，对城市自身存在的内在发展动力没有什么认识。没有外来工业建设项目的城市，一般都没有编制城市规划方案。正在编制的城市规划方案，往往只考虑重点工业建设项目给城市带来的相应发展，却没有考虑城市自身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已经编制城市规划方案的城市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很快就突破了规划方案的控制，许多新的建设项目逐步蚕食了规划方案划定的卫生防护地带和绿地。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前后断断续续近20年的工作失误，使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在很大程度

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国营工业生产不正常，社会上物资匮乏。然而，这一特殊情况却给街道工业和社队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长期未被人们注意的城镇内在的发展动力自发地显现出来。群众自发组建的各种小工厂，有的符合社会的需要，得到了发展，后来成长为城镇中举足轻重的主要工业企业；有的违背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较快地被时间所淘汰。这一段起伏动荡的历史在世界上也很罕见，它为我们认识城市内在力量运动的规律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现在已经有可能冷静地回顾当年的所作所为，寻觅事物发展的轨迹。然而，至今人们只注意到这段历史在总体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破坏，却很少注意那些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发发挥作用的某些客观规律的有益表现，而这些规律很有可能被用来作为推进今后城镇发展的动力。

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政策促进了我国和西方社会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我国沿海地区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以及海南省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92年又开放了长江沿岸28个城市和8个地区，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13个边境城市。使全国形成了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的长江沿岸地区、周边地区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地地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逐步被介绍到国内，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在许多方面吸收了西方土地开发经营管理的经验。然而，由于在城市规划理论上引进多于研究、分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致使在城市规划实践中形式上的模仿多于实质上的创新。有些人甚至仅仅满足于在口头上或文字上搀杂一些洋名词、洋术语。我赞成学习国外的经验和理论，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一切科学成就都可以为我所用。然而，既然要学习，就不能囫圇吞枣或玩弄名词，必须研究它、分析它，弄清各种国外

经验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针对的问题，然后消化和吸收它，把它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用于指导中国的实践。就好比服装师，既要看时装杂志，更要会量体裁衣，否则是做不出合身服装的。

改革开放也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原先的农业地区出现了不少农工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在社会组织结构上、经济活动规律上、城镇建设的内容和方式上都有许多前所未见的特色。特别是在城乡关系的统一协调上很可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城乡协调发展的理想，在西方只能长期停留在学者的理论上，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而中国的广大农民却在实践中创造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并在经济发展上和社会改造上取得累累硕果。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在1983年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以及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多方位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中蕴藏的这一巨大内在潜力。然而，至今城市规划界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一命题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仍然以城乡对立的传统观念，沿用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手法，把已经形成的农工一体化发展的村镇，硬是人为地划分为“城”和“乡”，只作“城”的规划，不顾“乡”的发展，切断了二者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市带县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有些地区仍然习惯于人为地集中发展中心城市，无端地强调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没有充分利用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城乡协调发展的强大活力，形成有利于全地区城乡全面繁荣的城镇网络。

总之，中国4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是丰富多采的，它足以成为城市规划工作者取之不尽的理论源泉。这个丰富的源泉是任何国外的城市规划理论所难以包含的，我们正站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既然错综复杂的社会机遇已经把我们这些人放到了城市规划的工作岗位上，那么，我们就应该自觉地承担起历史所赋予我们的重任——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规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